

农业贸易改革

——有利于澳大利亚大面积农业的改革措施

Neil Andrews, Benjamin Buetre, Alistair Davidson, Daniel McDonald, Frank Jotzo and Brian S. fisher 著

黄照影 译

原载：《澳大利亚商品》，2003年6月版，第10卷，第2期

澳大利亚的农业高度依赖于世界市场。澳大利亚相当部分的农产品是用于出口的，其农产品价格时刻反映世界市场的价格。全球农业政策的根本改革将会使世界市场的扭曲减少，在世界范围内提高农产品价格并为澳大利亚农民提供更多的贸易机会。

虽然 WTO 多哈回合中农业谈判的进展日渐缓慢，但谈判仍给扭曲农业贸易的根本性的政策改革提供了机会。由于澳大利亚的农业高度依赖于世界市场，这样的改革将会为澳大利亚的农民带来经济利益。例如凯恩斯集团所提出的改革会使农产品市场的扭曲减少，澳大利亚农业的门槛价格提高，农民的现金收入增加及土地价格上涨。

◆ 贸易改革的影响

澳大利亚农民未来的盈利性将高度依赖于世界市场。农产品产量的任何增加都需要在世界市场上进行出售，这使得澳大利亚农民成为价格接受者。其他国家的农业贸易政策通过限制进口、增加出口等方式扭曲了贸易，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压低世界市场的价格，并使澳大利亚农民的贸易机会减少。人们期望通过国际上努力来改革这些政策，这将会改进世界市场的状况，并提高澳大利亚农民的经济利益。

目前 WTO 的农业谈判是新一轮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的一部分，它为影响农业贸易的政策改革提供机会。本文的分析指出农业政策的自由化将给澳大利亚带来巨大的福利。据估计，凯恩斯集团的谈判建议将使澳大利亚 2010 年的 GNP 增加 21 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这笔收益将流入澳大利亚农民的手中。

据估计，以生产大田作物及奶产品的农民为例，其每人的现金收入将会分别增加\$10,900 和\$15,500。凯恩斯集团的建议还会使平均的土地价格上涨 17%，因而全球农业政策的改革将使农民的财富进一步增加。

◆ 澳大利亚经济中的农业

农业是澳大利亚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澳大利亚每年商品和服务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约为 20%。出口还将持续增加，因为澳大利亚农业产量连续几年持续增长，尽管农产品价格的投入产出比是呈不断下降趋势。（农民的贸易条件）（图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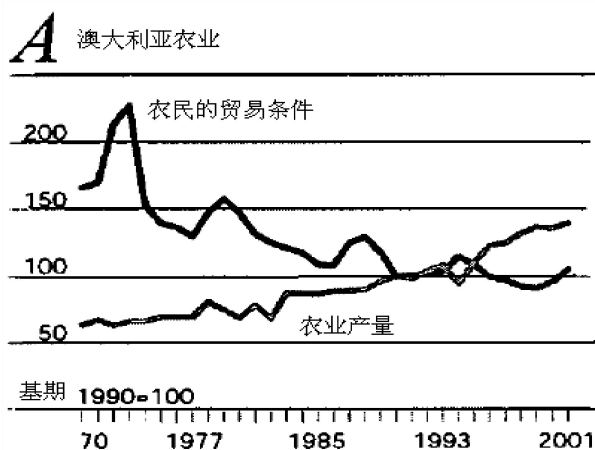


图 A 澳大利亚农业

在面对恶化的贸易条件下，要达到维持并增加产量的目的就需要提高农业生产率。比如在 1977-78 年至 2000-01 年期间，大面积农业的生产率平均每年增加 3.5 个百分点。在此期间，种植业生产率的提高是最为显著的，其年均生产率提高了 4.5 个百分点。(Hooper, Martin, Love and Fisher 2002)

◆ 澳大利亚农民依赖世界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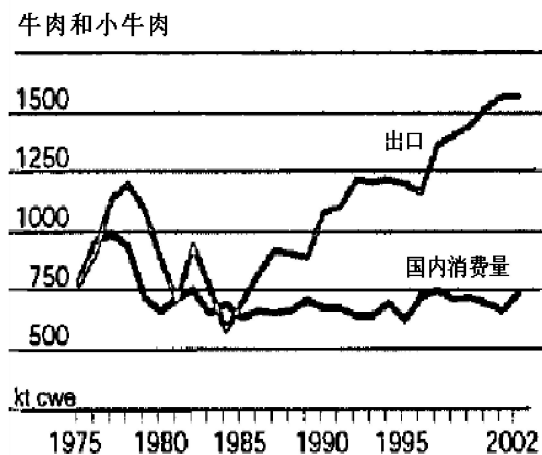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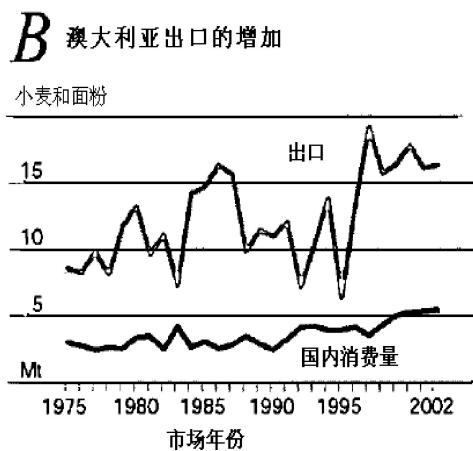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农民十分依赖世界市场，其农产品很大比例上是用于出口的。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农民所接受的农产品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紧密相联。同样地，澳大利亚农民的财富不可避免地与世界市场的情况相关联。

● 大部分产量用于出口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澳大利亚农产品产量不断增加。主要的生产者都采用了新技术，效率的提高是通过渐进的产业重组来实现的。相反的是，澳大利亚许多农产品的国内消费量并没有与产量的增加保持同步（如糖、小麦），或仅显示出微弱的增长（如牛肉、黄油）。

结果，澳大利亚农业出口依赖性加强，图 B 描述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口占农业产出份额的增长状况。

澳大利亚农民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这将使农产品的产量进一步增加。实际上，所有增加的产量可能都需要出口，这使农业部门更加依赖于世界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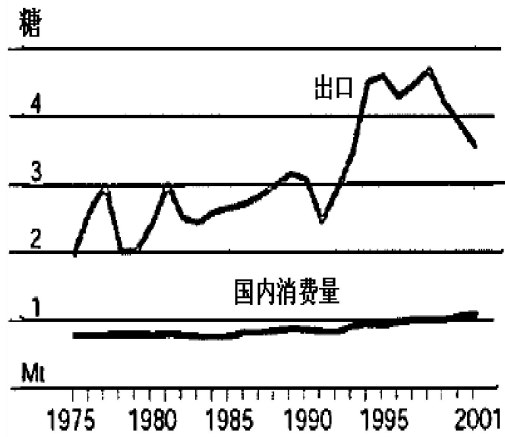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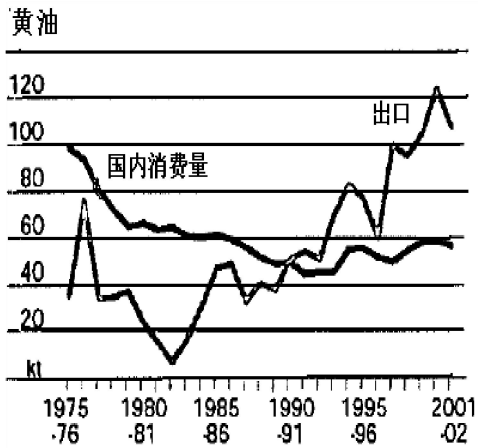


图 B 澳大利亚出口的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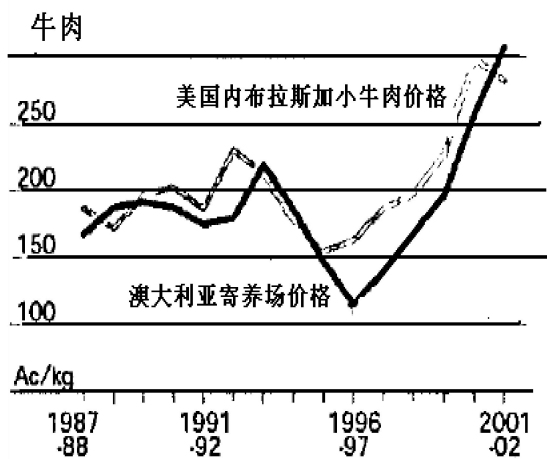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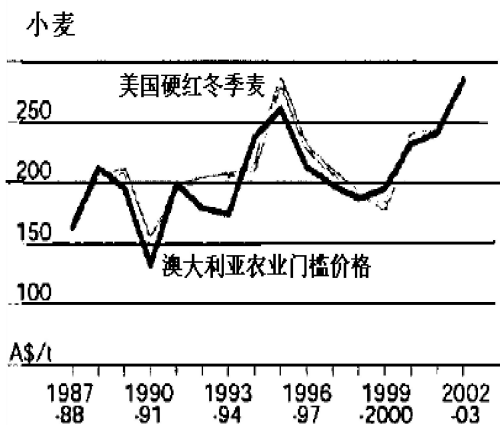
● 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世界市场的影响

澳大利亚农民所意识到的世界市场力量对价格的影响可通过澳大利亚农产品价格与世界指示价格的对比来说明。主要出口国的商品出口价格一般就被视为世界指示价格。虽然由于商品规格及运输成本的差异,澳大利亚商品价格水平与世界指示价格水平可能并非完全一样,但澳大利亚商品的价格在总体上还是反映了世界市场的价格变动。

供求关系的变动会造成澳大利亚与世界市场价格水平短期上的不一致。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大干旱可能增加谷物的国内需求,因此与国际价格相比国内价格升高。

对于以下四种主要的农产品,小麦,牛肉,牛奶和糖,澳大利亚与国际市场指示价格的关系可通过图 C 来说明。美国的价格被视为世界市场的价格,因为美国这些产品的贸易量在世界市场上是最多的。美国既是澳大利亚农产品的重要市场同时也是其重要的竞争者。美国的价格转化为澳元来消除汇率变动的影响。澳大利亚这四种商品的价格大体上与世界指示价格保持一致,仅有零星的、暂时的偏差。

C 澳大利亚和世界的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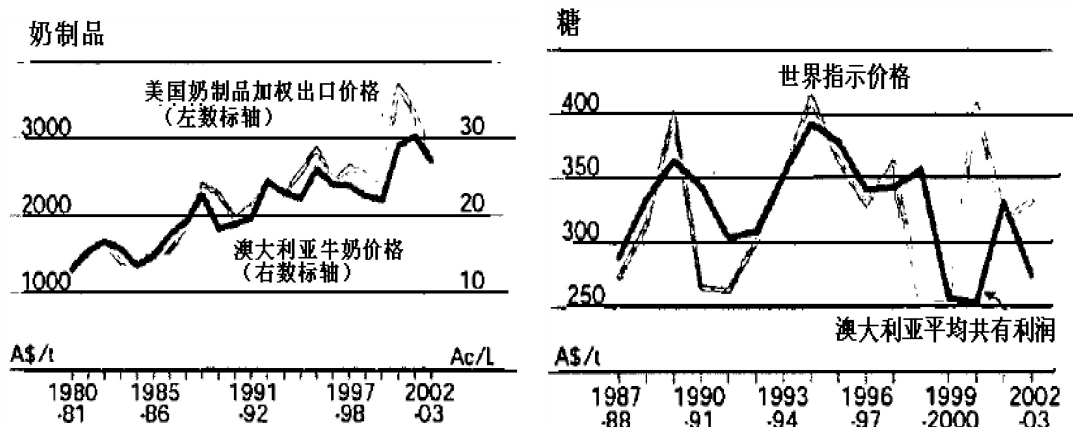


图 C 澳大利亚和世界的价格

在世界市场上澳大利亚农民实际上是价格的接受者，正如在上面的例子中所显示的那样，对于产品他们所接受的价格与世界市场的价格是紧密联系的。除此之外，农产品产量的任何增加绝大多数都需要在世界市场上进行销售。因此，澳大利亚农民的经济利益不仅与世界市场的状况相联系，还与影响这些市场的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相联系。

◆ 农业政策对世界市场的影响

在保护市场中有 3 个主要的政策工具用于维持较高的农民收入：限制市场进入的关税，对农民的国内补贴，对过剩产量的出口补贴。这些支持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依赖的，但都构成了对农民的高回报。结果，这些支持的提供不论对产业还是政府都是有吸引力的，但却不利于使用这些政策的国家的经济利益。（表 1）

表 1 反对保护的争论

政府经常面临对个别产业或部门提供补助及其他保护手段的要求。当相关产业面临低价格，市场份额的减少或者来自其他供应者的激烈竞争时，就会要求政府提供保护。如果其他国家的竞争者接受了来自他们本国政府的支持时，这种受保护的要求就会增强。

然而，这种保护损害了该国整体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也损害了受保护行业长期的经济利益。

如果一个经济体是高度竞争的，并且没有经济扭曲，那么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贸易流动总是使用其所拥有的相对丰裕的要素。然而，行业保护的提供阻止了要素流向最有效配置的部门。对任何一个行业保护的提供都会使资源从没有保护的、具有较高生产能力的部门流向接受保护的、具有较低生产能力的部门。因此，整个经济体的资源配置就变的不再有效，整个社会的福利就减少了。

除了引导资源向较无效率的部门进行配置之外，保护还使那些部门采用较有效的管理方式和先进技术的积极性减弱，从而降低其整体的竞争力。从中长期来看，受保护行业的经济前景将进一步削弱。

保护还将产生的一个进一步的潜在危险是它可能导致其他国家不具优势的生产者的报复，这将造成螺旋式的保护。越多的国家引导资源投向保护行业中，这些产品的世界供应量就会越多。世界市场供应量的增加就会压低该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这就造成了要求进一步的保护，周而复始。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世界小麦市场上欧盟和美国逐步加大保护力度印证了以上说法。

在有保护政策的国家里，更高更稳定的国内价格刺激了生产。此外，较高的国内价格使消费量减少，再加上较高的产量造成了进口的减少，出口的增加。基于减少的进口需求及增

加的出口供给，相对于没有保护的情况，世界市场的价格变得更低，更不稳定。对于诸如澳大利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生产者来说，较低的国际价格减少了他们出口的动力。

目前，仍存在较高保护水平的国家是欧盟、美国和日本。在一些农业支持方面，欧盟将倾向于较少扭曲的安排，但一旦中欧和东欧 10 国于 2004 年 5 月加入欧盟之后，对国际贸易的扭曲将进一步加剧。在美国 2002 年通过的农业法案规定从次年开始禁止使用高水平的资助。

很大比例的农民收入是来自于政府的补贴，这使得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补贴对农民具有重要意义。（图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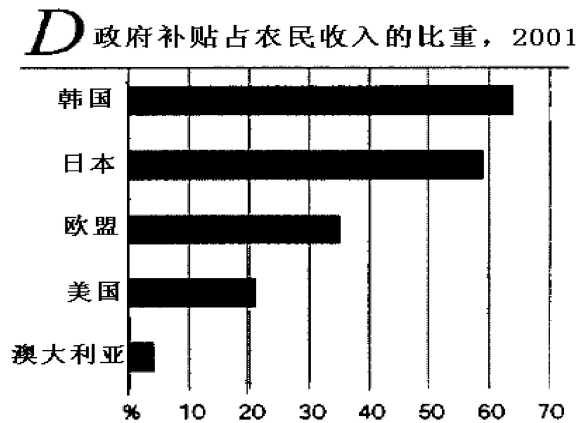


图 D 政府补贴占农民收入的比重

在世界范围内提供给农民的高水平的农业保护，通过降低世界市场价格和限制贸易机会来减少澳大利亚农民获得的利润。在全球范围中减少农业补贴是澳大利亚农民的利益所在。这种行为将使澳大利亚生产者在世界市场上减少与受补贴农民的竞争，大量受保护市场的消费量增加并使国际市场价格提高。对澳大利亚出口商及农产品的生产者来说，国际市场上较少扭曲的将会转化为较高及更稳定的价格。因此，多边贸易改革对于澳大利亚农民和农业社区关系重大。

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意识到关键的一点，更大的持续更长久的经济利益将会超过调整所引起的暂时的损失。（见表 2）试图减少农业保护的多边合作将带来潜在的利益，因为改革的压力不只是来自于单一国家的农民身上，当其他国家相继进行改革的时候，改革更容易从政治上取得成功。再者，许多国家同时采取的农业保护的削减将为世界市场价格的提高提供更广阔的前景，这能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抵消那些因补贴减少而遭受的损失。

表 2 减少保护的调整成本

减少或撤消保护会造成行业的调整成本。调整成本常常集中在保护行业所运作的那些区域。这将阻碍公众对改革的接受，而改革最终却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改革成本是显而易见、相对也是立即呈现的。相反，改革的收益却是扩散于整个经济体，并不容易察觉，并且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

改革成本的迅速出现和相对长期的收益使人们更加关注从撤消保护中产生的改革成本。改革成本取决于要素的可流动性。一些可替代的物质资源具有特定属性，这造成投资者的巨大损失。其他要素可被移作他用，从而减少了改革成本。

对社会的特别关注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改革成本方面。补助的提供会使社会中某些行业的就业率高于

在市场条件下的正常赢利水平。然而在其他行业也可能出现就业的减少，主要通过与其他活动争夺劳动力以及在整个社会中减少收入。

保护的撤消会导致某些行业的紧缩，而它是否会使整个社会总的就业减少却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其他的就业机会为社会提供更高的收入，这样对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就会减少。但对那些受直接影响的人来说适应改变的环境还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如果劳动力市场是有弹性的，可替代的劳动力是自由流动且具有可适应的技能，那么调整成本就会比那些不能自由流动，且缺少适应新岗位技能的劳动力小的多。在一个充满国际竞争的经济社会里，教育和培训是提高劳动力的适应性及降低改革成本的关键因素。通过较早公布削减计划以及分阶段削减资助，一些调整成本将会降低。

◆ 国内贸易的改革

当其他国家进行保护减让时，一个国家很容易从政治上进行效仿，但人们经常没有很好地理解消除本国的贸易壁垒，不论是在农业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对开放国都是有利的。

通过专业化生产，国家可以从贸易中大量获利。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自然、人力和技术资源。贸易使得每个国家将资源配置到可以最有效利用的行业中去。专业化生产显然是基于对特定行业十分重要的高质量丰裕要素的使用。比如，相对于其他资源及与其他国家相比，澳大利亚较大份额的农业部门反映了澳大利亚较丰裕的多产的土地。（罗伯特 1997）

一个大国具有多样化的资源，它有能力生产国内所需的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然而，这样做就需要把资源从最有效配置的部门转移到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有效供应者的部门。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相对于追求所有产品和服务的自给，总会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一个重要问题并非是否该国资源去生产一个特定商品，而是考虑如果一国没有把这些资源投入到最有效配置的行业，那么将有多少的出口收入或者有多少的其他产品的进口替代会失去。单方面地减少保护，使资源流向更有效配置的部门，是会增加一个经济整体的收入。

凭借消除关税壁垒和行业补助政策所达到的国际贸易自由化，使所有国家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最有效配置资源中分享获利，而非限制每一个国家只获取在其本国范围内所获得的商品。

追求开放市场政策的利益可从对比两个相似国家，中国和印度中得到阐明。两个国家都有丰裕的劳动力，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两国制造能力都较弱。然而二者收入的增长却有显著不同。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相对于印度的逐步开放模式，中国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政策（图 E），这可以通过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图 F）。这与中国的收入增长速度比印度更快相吻合，虽然印度的收入同时也在增长。简而言之，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较大程度的开放促使了收入的增长，其增长率是印度的两倍。

E 中国：较大的开放促使了更快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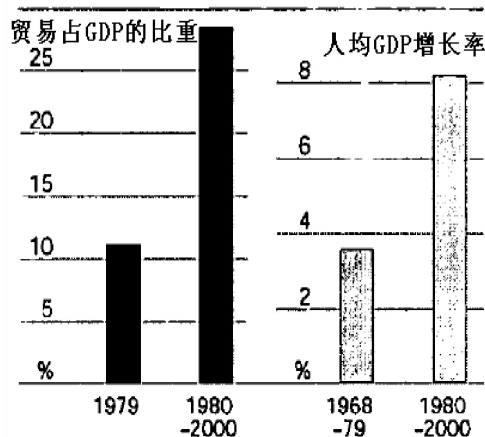


图 E 中国：较大的开放促使了更快的增长

F 印度：渐进的开放带来了较慢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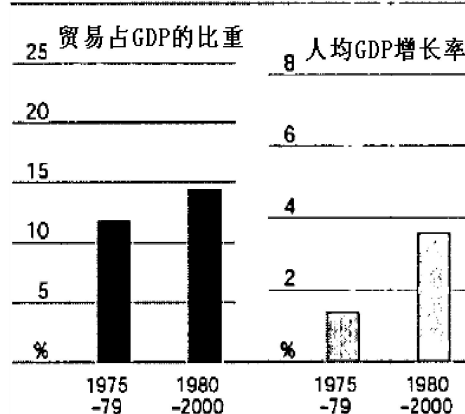


图 F 印度：渐进的开放带来了较慢的增长

◆ 农业多边贸易谈判

WTO 是一个减少贸易壁垒的多边贸易谈判的论坛。从最初于 1947 年建立的关税同盟（WTO 的前身）开始，已经经历了好几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从农业方面来看，最重要的论坛是乌拉圭回合（1986-94），以及目前的多哈发展回合。

● 乌拉圭回合的结果

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对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它第一次将农产品贸易问题列入到国际贸易规则中。

为易于谈判，主要的农业政策被分为三大类：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竞争。市场准入主要集中于关税、进口配额及其他限制进入国内市场的非关税壁垒。国内支持涵盖了对农民的直接支付，价格支持计划，农业投入补贴等等。出口竞争包括涉及出口补贴，出口信贷及食品援助的相关政策。除了对所有成员国发布农业政策改革之外，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履行较少要求的政策改革及较长期限的执行期，这被称之为特殊区分对待。

虽然已经达成的限度和减让仍然允许部分的保护，但 WTO 成员第一次同意减少出口补贴，削减扭曲国内补助的贸易额，以及进一步减少市场准入的壁垒，这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业协定的主要内容详见表 3。

特别是出口补贴的减让，和在一些情况下市场准入的增加都提高了世界市场价格，增加了贸易量。然而，尽量已经做出了以上承诺，但在世界范围内提供的资助仍然是很大的。这意味着进一步推进国际农业政策的改革函待进行。

表 3 乌拉圭回合中达成哪些协议

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分别协商了关于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限度等方面的条款。（WTO 1995）

市场准入

- 之前存在的非关税壁垒必须转化为以 1986-88 为基期的等价关税，这称之为关税化过程。生成的关税受 WTO 约束，加上已存在的关税，他们在执行期中将以 36% 的平均水平削减，对于任何一种关税最小要削减 15%。
- 作为关税化方案的一部分，进口的最小准入水平应从基本消费量的 3% 上升到 5%，而目前的准入水平被确定。这些方法被运用关税配额的实施过程中（对于特定数量的进口实施减让的关税，对

于额外的进口实施正常关税)。

- 关税减让和关税配额已被应用到单一产品或关税率水平。

国内支持

- 每个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可用综合支持量 (AMS) 来衡量对于农业其不予免除的国内支持的水平。综合支持量又被称之为黄箱补贴, 它规定以 1986-88 年为基期, 在执行期内减让 20%。AMS 由两部分组成, 一种是价格支持, 由所实施的支持价格与固定的外部参考价格的差值再乘以符合接受支持价格的产品数量。另一种是不可免除的国内补贴。
- 有一系列的支持补贴是不受限制或免除减让的。这被分为两种。一种是限产计划的支持, 被称为免除的“蓝箱补贴”; 另一种被称为是“绿箱补贴”支持, 是通过政府服务、出于食品安全目的的储备补助、国内粮食援助, 以及一系列包括非关联的收入补助、收入保险和安全网络计划的政府资助、干旱救济、结构性调整补贴、投资援助、环境保护计划和地区援助计划项下的支付等。绿箱补贴被视为最小程度的扭曲。
- 除此之外, 对于特定商品和非特定商品的支持少于全部农业生产总值的特定比例时 (发达国家 5%, 发展中国家 10%), 则也可免除削减。这被称之为微量免除。

出口补贴

- 受补贴的出口产品数量削减 21%, 单一产品出口补贴的预算支出削减 36%。该减让以 1986-90 为基期, 与市场准入和国内支持的承诺类似实行同样的执行期。

● 多哈回合谈判的进展

新一轮全面的贸易协议谈判, 多哈发展回合于 2001 年 11 月在卡塔尔的多哈举行的 WTO 第 4 次部长级会议中正式启动。值得注目的是, 多哈部长宣言为农业谈判确定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在农业方面, 多哈声明使 WTO 成员一致认为, 全面谈判的目标是大幅度提高市场准入、着眼于逐步淘汰的目的来减少各种形式的出口补贴和大幅度减少造成贸易扭曲的国内支持。(WTO 2003) 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区别待遇将是谈判的一个组成部份。

为了在农业谈判模式上达成共识, 多哈部长级会议要求把 2003 年 3 月 31 日定为协商国的最终期限。其中涉及到诸如对关税、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的削减程度及方法, 分阶段削减的时间框架, 对发展中国家做出让步的性质和程度等方面的议题。作为议程的一部分, 凯恩斯集团和美国都提出了关于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全面且艰巨的计划。然而, 其他 WTO 成员国如欧盟仅提出最低限度的提议。

为了缩小众多 WTO 成员国间立场的分歧, WTO 农业协商主席斯图亚特·哈滨逊在 2003 年 2 月提交了一份草拟的模式草案。虽然凯恩斯集团和美国都对哈滨逊提案中的目标程度不满意, 但都觉得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多方协商的基础。然而, 欧盟和日本都认为这份草案要求过高, 且不平衡 (Fischler 2003a,b; Kamei 2003)。结果, 关于模式问题却未能在 3 月 31 日的截止日期达成一致。

农业技术性议题的协商被列入计划表并在 2003 年 11 月举行的坎昆部长级会议的筹备会上进行协商。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并不知道 WTO 的成员国在模式问题上能否在坎昆的筹备会议或其部长级会议上达成一致。

尽管模式问题没有如期达成共识, WTO 农业协商的多哈回合仍为农业方面扭曲政策的基础性改革提供了机会。澳大利亚农业高度依赖出口, 协商所引发的改革对澳大利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国际市场的准入, 减少扭曲农业产量及贸易的支持方式。

◆ 农业贸易改革的影响

凯恩斯集团关于农业贸易改革的提议对澳大利亚农业的影响可用澳大利亚农业资源经济局的全球贸易环境模型 (GTEM) 来解释。GTEM 是动态可计算的全球经济的一般均衡模

型，为分析国际及国内的政策改革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框架。它考虑到通过贸易和投资所引发的一国不同部门间以及不同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它使用澳大利亚农业资源经济局修订过的全球贸易分析项目第 5 版的数据，这是基于 1997 年全球经济各国家地区间的数据。

运用 GTEM 模型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假设在考察的时期内除了之前已宣布的区域贸易协定外，没有政策改变的发生，目的是要决定一个正常贸易的基准线或相关变量期望值的参考值。为了这种分析，所推算的参考值是从 1997 年到 2010 年。

在参考值中，假定各国的增长率决定其主要变量的变化。然后假设政策的改变发生，模型用来决定相关变量偏离参考值的水平。参照值和政策改变后产生的新数值之间的差异表明了政策改变的影响。

凯恩斯集团提议中三个主要要素是在政策发生改变之后同时进行衡量的。出口补贴以及扭曲生产和贸易的各种形式的国内支持都被取消。关于市场准入，使用“瑞士公式”对约束税率进行大幅度削减。

对于发达国家，在公式中使用的系数为 25；对于发展中国家，约束税率可实行较小程度的减让：

- 当最初约束税率为 0%-50% 时，瑞士公式用 50 的系数来使该区间的关税减少至 25% 或更低。
- 在最初约束税率为 50%-250% 时，关税将减少 50%。
- 在最初约束税率为 0%-50% 时，关税将减少 50%。
- 在最初约束税率超过 250% 时，关税将减少至 125%。

很少的发达国家可免除于所承诺的改革。关于凯恩斯集团提议的具体内容详见下表中凯恩斯集团 (2002a,b,c)。关于约束和适用税率、补贴和国内支持的相关信息是从 WTO 成员国及 OECD 的报告中获得的。

凯恩斯集团

为了实行全球农业贸易改革，凯恩斯集团于 1986 年由 17 个农业出口国组建成立。其成员国目前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西兰、巴拉圭、菲律宾、南非、泰国和乌拉圭。

在承诺的政策改革过程中，只有当新的约束税率小于目前的适用税率时，对约束税率的相应削减才是足够的，那么模型所应用的适用税率才进行削减。在适用税率中的此类削减程度要小于上述约定税率的削减。

凯恩斯集团的市场准入提议要求发达国家将关税配额提高国内消费量的 20%，发展中国家提高 14%。其该方面的提议并没有结合到目前的分析中。在市场上最终超出配额部分的关税限制了超出配额的进口，凯恩斯集团提议对于贸易的实际影响会比分析中估计的更大。

在拟合方程中假设改革发生在 2005 年至 2010 年，不考虑贸易改革所引起的生产力的提高，拟合方程中产生的估计量可能会低估凯恩斯集团提议所产生的效果。

瑞士公式

该关税减让公式为关税设置了一个上限，对于高关税产品的降税远高于低关税产品的降幅。

公式如下所示：

$$\text{最终关税} = A \times \text{原税率} / A + \text{原税率}$$

其中，系数 A 是所有税率的上限。

比如，根据凯恩斯集团的提议，对于一个发达国家，其 40% 的原始约束税率将削减为 15.4% 的最终约定税率（使用的系数为 25），同样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其 40% 的原始约定税率将会被削减为 22.2% 的最终约定税率（使用的系数为 50），即：

$$25 \times 40 / 25 + 40 = 1000 / 65 = 15.4\%$$

$$50 \times 40 / 50 + 40 = 2000 / 90 = 22.2\%$$

● 澳大利亚大面积农业及奶制品业所受的影响

据估计，实施凯恩斯集团的提议，到 2010 年为止澳大利亚 GNP 每年将增加 21 亿澳元。这就是在 2010 年实施凯恩斯集团提议的估计值与参考值或 2010 年正常贸易情况预测值之间 GNP 的差额。

全球改革使市场扭曲减少，也提高了澳大利亚产品的出口价格。它转化为更高的农产品门槛价格，为农民增加产量提供了动力。相对于 2010 年的参考值来说，澳大利亚大田农作物和奶制品估计价格的变化见图 G。这些价格的改变将是全球政策改革的永久结果。

当其他变化发生时价格还将持续上下波动时，平均价格由于全球改革会高于没有改革的情况。澳大利亚农产品的高价格会导致澳元的升值。图 G 中所显示的价格影响是发生在政策改变过程中，假定汇率上升之后。

G 贸易改革后澳大利亚价格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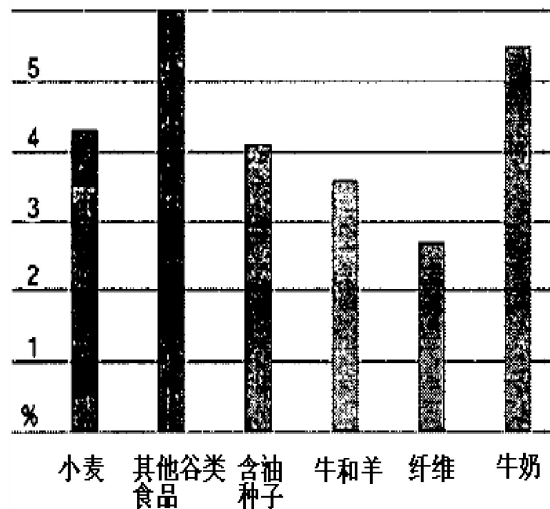


图 G 贸易改革后澳大利亚的价格变化

1. 从农业贸易改革中预计增加的农民现金收入

凯恩斯集团提议 2001-02

	农民平均现金收入	改革的增加额
	\$/农田	\$/农田
小麦及其他农作物	206600	26500

家禽及农作物相混合	118300	10700
羊	57200	6100
牛肉	70900	8200
羊-牛肉	60800	7600
大面积农业	105900	11800
奶制品	10570	17700

在主要的世界市场由于保护减少所引起的农产品价格的增加在澳大利亚将转化为更高的农民收入。表 1 是对可能增加幅度的粗略描述，若世界市场按照凯恩斯集团的提议进行改革，表 1 的数据显示主要行业农民平均收入的提高。表 1 中的信息是以澳大利亚农民 2001-02 年的收入为基础，根据图 G 中所示的预期的澳大利亚农产品的门槛价格的提高，相应增加农民收入而计算得到。

对澳大利亚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就相应地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同样地，若按照凯恩斯集团提议所发生变革，澳大利亚土地价格预计到 2010 年将上涨 17%。结果，由于基本的政策改革澳大利亚农民的福利会改善。

当讨论贸易改革对农民收入可能产生的影响时，很重要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任何持久的农业门槛利润的增加都会使资源从其他部门转移到农业生产部门。在实际中，现有的农民将会投资并扩大他们的农业生产，当然也有新的农民和投资者会被吸引到该部门。同时，澳大利亚农业的数量和结构也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包括技术的改变，经济增长和其他部门的收入，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然而，总而言之，在澳大利亚农业贸易改革所产生的持续更高的、更稳定的农业门槛价格将会带来更高、更稳定的农民收入。很显然这是有利于对农民的，同时也波及更大的农村团体。

◆ 结束语

目前 WTO 农业协议是新一轮多哈回合的组成部分，它为农业贸易的政策改革提供了机会。然而，目前进展却是缓慢的。特别诸如规模、方法、关税减让的时间安排、出口补贴和扭曲贸易国内支持等议题，协商国都没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达成共识。与农业相关的技术方面的协议也被列入 2003 年 11 月举行的坎昆部长级会议的筹备会中。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无法知道 WTO 各成员国能否就其形式在坎昆会议的筹备会中或在其部长级会议上达成一致。

尽管目前没能在模式上达成共识，WTO 农业协议的多哈回合还是为扭曲农业贸易的政策改革提供了机会。由于澳大利亚农业高度依赖世界市场，这种改革会给澳大利亚农业带来经济利益。类似凯恩斯集团提议的改革将会使农业市场扭曲的减少，提高澳大利亚农业门槛价格、增加农民现金收入和提高土地价格。

译者单位：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邮政编码：361005

